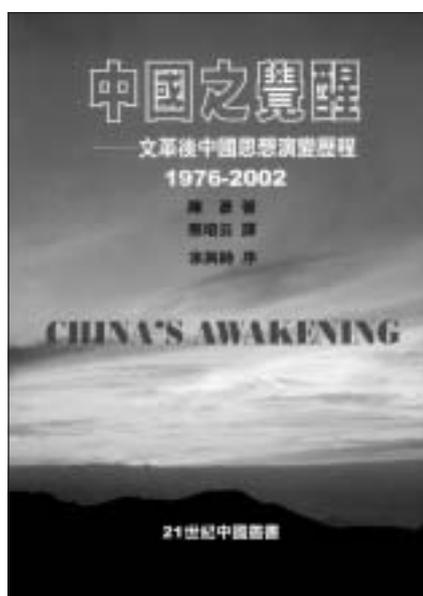


## 當代中國社會思想的歷史記錄

● 徐友漁



陳彥著，熊培云譯：《中國之覺醒——文革後中國思想演變歷程 1976-2002》（香港：田園書屋，2006）。

處在社會急劇轉型時期的中國，不但有令人眼花繚亂的種種現象值得關注，還有對立爭執的思想流派值得討論和評論。近年來，每當我向人們——有生活在大陸本土的，也有海外的——解說當今中國的社會思想時，總是感到比較吃力，因為事情和頭緒太多，而且文

字之後的背景太深沉，論戰當事人之間的關係太複雜。但是，當我在2006年6月在巴黎法國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作關於當代中國社會思想的講座時，卻感到格外輕鬆和順暢，聽眾對有關材料和背景以及不同思想流派的路數好像很熟悉，交流和討論很在點子上。我後來得知，陳彥剛用法語出版了一部關於當代中國思想的專著，所以巴黎的知識界對這個題目是熟悉的。

現在，陳彥的《中國之覺醒——文革後中國思想演變歷程 1976-2002》（以下簡稱《中國之覺醒》，下引此書只註頁碼）翻譯為中文出版，它一定會為中文知識界更深入地了解和推進當代中國思想的發展發揮作用。

當代中國思想紛繁複雜，僅僅是文獻材料的收集就不太容易，準確理解和深入研究就更考驗人的功夫和水平。近年來，我們有諸如《田野來風》、《知識份子立場》（三卷，分別是《激進與保守之間的動蕩》、《民族主義與轉型期中國的命運》、《自由主義之爭與中國思想界的分化》）、《九十年代文存》、《思潮：中國「新左派」及其影響》、《潛

陳彥的《中國之覺醒》一定會為中文知識界更深入地了解和推進當代中國思想的發展發揮作用。作者身在法國，能查閱大陸學者接觸不到的材料，與海外政治活動人士保持聯繫，審視中國問題可以借助於使用法語而取得一種地理、文化上的審美距離。余英時讚揚此書是「內在參與」和「外在觀察」合而為一的結晶，一方面「得其環中」，另一方面又「超以象外」。

此書把1976年至近年的中國思想史，處理為這一歷史時期社會運動和重大事件在思想文化上的反映，而不是當成純粹的思想史。這將近三十年的思想變遷，看作是中國知識界的新派人物為了實現現代化目標，為了社會進步，用先進的、現代的意識形態取代陳舊的、前現代的意識形態努力的結果，也是他們追求真理，力求在思想學術上創新努力的體現。

流：對狹隘民族主義的批判與反思》等資料彙編，但認真閱讀之後可以發現，編輯者囿於自己的立場、眼光或能力，彙集的文獻常有重大缺漏。既然全面、權威的材料彙編尚付闕如，那麼沒有專著出版也應該在情理之中。

但是，去國多年，身在法國的陳彥現在卻發表了自己的著作，這既令人欣慰，也有些出人意外。其實，作者的優勢是自然的、明顯的。

作者在本書〈前言〉中講到自己生活在法國所獲得的便利條件：能查閱大陸學者接觸不到的材料，與海外政治活動人士保持聯繫，審視中國問題可以借助於使用法語而取得一種地理、文化上的審美距離。法國著名漢學家汪德邁 (Léon Vandermeersch) 在〈法文版序〉中說，處理本書題材需要兩個條件：既需要掌握大量材料又需要與現實和歷史有一段距離，「沒有任何人可以同本書作者一樣能夠如此完好地符合上述雙重條件：既是中國人又飽受法國文化熏陶」。而余英時在〈代序〉中讚揚說：「本書是『內在參與』和『外在觀察』合而為一的結晶，用中國傳統的觀念說，一方面『得其環中』，另一方面又『超以象外』。」

在我看來，以上所言的有利條件是非常重要的，但還不是關鍵。最重要的是作者多年來一直關注着中國社會的發展變化，關注着與此相關的社會思想的產生和爭論，而且親身參與到不少討論之中。作者身在海外，但心在中國，作者的心

與時代的脈搏一起跳動。現在有不少中國學人，不論他們在國內還是在國外，因為想在中國這個大舞台上扮演一個角色，竭盡全力對中國問題發言。但與其說他們對於中國的現實有真切的研究和體悟，不如說只是善於抓住話題發揮，使公共舞台的燈光聚焦在自己身上，中國問題只是他們表演的由頭或道具。他們的話語和心態表明他們——用昆德拉 (Milan Kundera) 的話來說——「生活在別處」，用阿倫特 (Hannah Arendt) 在《黑暗時代的人們》(Men in Dark Times) 中的話來說就是，他們在精神上出現一種所謂「內在移民」現象，他們生活在中國卻好像不屬於這個國度，他們的言論使人想起文革時期發表歌頌言論的「愛國老華僑」。陳彥的書完全沒有「華僑」腔或「漢學家」腔。

《中國之覺醒》一書把1976年至近年的中國思想史，處理為這一歷史時期社會運動和重大事件在思想文化上的反映，而不是當成純粹的思想史，我對這一方法首先表示肯定和贊同。這與作者的歷史學專業背景有關，也與他的現實感有關。我認為，一百多年來中國很難說有一部純正的思想史，中國的社會思想還沒有機會和條件成熟為獨立、自主、自治，有深厚傳統，大體上可以在思想文化領域自行發展的實體。中國人總是面臨異常急迫的政治、社會問題，最有責任心和學識的人不得不全力以赴應對這些問題，哪怕他們有心，也很難有條件兩耳不問窗外事，在純思辨的天地遨遊，在思想、學術傳統和流派傳

承的空間和格局中做學問。他們的首要任務是為破除阻礙歷史前進的舊意識形態吶喊，為新生事物的出現鳴鑼開道，所以我們的大家和文化英雄往往是開風氣之先的闖將，而非真正極有創見或集大成的思想家。本書用「現實決定意識」或「以理論應付挑戰」的模式來解釋思想的產生和展開，我認為是符合實際情況的，非如此不能理解和解釋理論家為甚麼看重這些而不是那些問題，為甚麼這樣地而不是那樣地研究和回答問題。

但從另一方面看，我又認為僅僅滿足於這一點或完全局限於這一點是本書的缺陷之一。這將近三十年的思想變遷，可以看作是中國知識界的新派人物為了實現現代化目標，為了社會進步，用先進的、現代的意識形態取代陳舊的、前現代的意識形態努力的結果，但同時也是他們追求真理，力求在思想學術上創新努力的體現。時過境遷之後，當中國人面臨新的歷史任務和問題時，這些思想中很可能有一部分具有長久的意義，這不僅僅是對後人有啟發而言，而是在純粹思想、學術的意義而言。

比如，作者談到了金觀濤、劉青峰提出的中國文化「超穩定結構」的理論（頁99、104-105），認為這打破了長期居於統治地位的、教條的歷史唯物論，這是對的。但我以為這個理論到底在學理上有多少根據，與其他歷史觀的關係如何，也是值得討論的。我相信，理論的建構者肯定有「推動社會進步」、「破舊立新」的動機，但也有（甚至更有）

學術上的真誠性。這個理論不僅是意識形態場域中競爭、衝突的一方，也是一件力求完美、客觀的精神產品，要受到學術界同行的批評，受到實踐的檢驗。

作者還談到了李澤厚對康德哲學的研究，對中國古代、近代、當代思想史的重建（頁106-107），這些學術性理論固然有「為此時的文化運動提供了哲學與歷史的正當性……成為反對官方意識形態的有力思想武器」（頁107）這種客觀作用，但它們同時也是學術性見解，其對錯、優劣可以用公認的標準來批評，其原創性和真實性將決定它們在今後中國思想史上的地位。

本書作者認為，1980年代的思想文化運動，以解構支配了這之前三十年的舊意識形態為目的（頁85）。1980年代以來的巨變雄辯地證明了舊意識形態的衰亡（頁359），到了1990年代，官方在實際上放棄了這種意識形態（頁261）。本書以近一半的篇幅來描述和證明這一點，其間充滿敏銳的觀察和深入的分析。我基本上同意作者的看法，但覺得需要表述和補充得更為準確、周全。十多年以來，海內外不少人認為經過1980年代的解構和1980年代末的巨大震撼，舊有的意識形態已經全然衰亡，現在純屬一件隨時會被徹底拋棄的外衣，完全沒有實際作用。我認為這有點低估了舊意識形態的頑固性和慣性，從而低估了繼續堅持啟蒙的必要性。

作者說，1980年代的思想運動由兩部分組成，一是體制內的思想

作者說1980年代的思想運動由兩部分組成，一是體制內的思想解放運動，二是民間的文化運動，二者的共同目的都是解構舊意識形態。到了1990年代，官方在實際上放棄了這種意識形態。我認為舊意識形態有兩層含義，一是原典、原教旨，二是極左化了的野蠻形態。1980年代體制內的努力是要消解後者而恢復到前者，實際上舊意識形態還在起作用。最近幾年很多人都感覺到了「意識形態向左轉」，這說明斷言官方在實際上放棄了舊的意識形態還稍微早了一點。

2006年以回顧和反思為特色，話劇《我們走在大路上》把這三十年總結為，1980年代確立的是「虎狼之道」，1990年代則展開為「虎狼世界」，以批判精神為標榜，卻錯誤地認識和描述歷史。1980年代的文化熱是另一個回顧、反思的重點，《八十年代訪談錄》引起了學者和媒體的注意，問題是能否如實地回顧那一段歷史。另一個毛病是用文學化的方法來描述1980年代。相比之下，《中國之覺醒》的歷史視角、歷史情懷顯得格外可貴，其基本點是尊重歷史。

解放運動，二是民間的文化運動，二者的共同目的都是解構舊意識形態(頁85)。根據我在1980年代的親身經驗，我以為需要對第一項運動作仔細辨析。實際上，舊意識形態有兩層含義，一是原典、原教旨，二是極左化了的野蠻形態。1980年代體制內的努力是要消解後者而恢復到前者，這當然是進步，但第一種教條也會成為思想控制的工具。我們既應該看到二者的區別，也應該看到二者的內在一致性。事實上，今日的意識形態是兩種成分的混合物，它通過小學、中學、大學的教科書，考試的標準答案，通過為數不少的「評閱組」作為審查報刊文章的標準等等起作用。我們可以在它沒有生命力，少有真正的信仰者這種意義上說它的衰亡，但它實際上還在起作用，而且是巨大的作用。不承認這一點，就不能解釋最近劉國光、鞏獻田等人的活躍，以及在歷史教科書問題上對袁偉時的批判。最近幾年，很多人都感覺到了「意識形態向左轉」，這說明，斷言官方在實際上放棄了舊有的意識形態還稍微早了一點，稍微樂觀了一點。

2006年以回顧和反思為特色，10月和11月，京城小舞台上演出的話劇《我們走在大路上》引起了激烈爭論。該劇是從社會心理的角度「對近三十年中國當代史的一次回顧」，它把這三十年總結為，1980年代確立的是「虎狼之道」，1990年代則「通過全面的市場化私有化政策展開為虎狼世界」，而今天的種種不幸源於知識份子鼓吹自由與民

主。這種荒謬的評判理所當然會受到人們的抵制，劇作者以批判精神為自我標榜，但批判不能建基於錯誤地認識和描述歷史。1980年代的文化熱是另一個回顧、反思的重點和熱點，《八十年代訪談錄》引起了學者和媒體的注意與議論，問題也是能否如實地回顧那一段歷史。若干1980年代的風雲人物出來現身說法，重提自己當年的豪邁，貶抑其他人物、其他文化團隊和流派，甚至貶抑當年的同伴，偽造自己的思想立場和經歷，以此表明自己的高瞻遠矚。另一個毛病是缺乏歷史的眼光，用文學化的方法、語氣來描述1980年代，這引起了更年輕一代的反感，比如有人評論說：

每一位回想起80年代的人都想變成文學家，甚至是抒情詩人。他們想起那些逝去的時光和青春，總難免多愁善感……他們的公開理由是尋找「烏托邦」，重返理想主義年代。實際上他們是在自我撩撥，勾起了遺忘已久的文學夢幻。(張檸：〈沉入八十年代的夢幻〉，《新京報》，2006年5月25日，C02版。)

確實，回味1980年代的人當中，文學家太多了，即使不是文學家，也容易用文學的方式把1980年代講成一個青春和激情的故事。

相比之下，《中國之覺醒》一書的歷史視角、歷史情懷顯得格外可貴。當然，歷史視角、歷史情懷的基本點是尊重歷史，我們只有在可信的基礎上談論問題，追求深刻與洞見。